

保健組織學講義



山 东 医 学 院

1958.2.

26054

目 录

緒 言	(1)
第 一 章 保健組織的理論基礎	(3)
第 二 章 保健史及保健原則	(6)
第一节 世界保健史	(6)
第二节 中国保健史	(14)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保健原則	(25)
第 三 章 居民卫生状况的研究方法——卫生統計的方法	(32)
第一节 卫生統計的意义及步驟	(34)
第二节 統計計劃	(34)
第三节 統計資料的蒐集——統計調查	(35)
第四节 統計整理	(35)
第五节 統計計算	(39)
第六节 統計图示	(53)
第七节 統計分析	(57)
第 四 章 人口統計	(59)
第一节 人口統計的意义	(59)
第二节 人口資料的蒐集方法	(59)
第三节 人口静态資料——人口数及人口构成	(60)
第四节 人口动态資料	(61)
第 五 章 疾病統計	(73)
第一节 疾病統計的資料来源及方法	(74)
第二节 疾病統計的指标及其規律性	(77)
第 六 章 居民生長发育統計	(83)
第一节 生長发育統計的意义及方法	(83)
第二节 不同社会制度的生長发育状况	(88)
第 七 章 全国保健組織機構	(91)
第一节 建立保健組織機構的意义和基本原則	(91)
第二节 保健組織機構的类型	(91)
第 八 章 医疗預防組織	(94)
第一节 綜合医院	(99)

第二节	疗养机构及休养所	(128)
第三节	防治所	(130)
第四节	妇幼保健机构	(132)
第九章	卫生防疫組織	(138)
第一节	卫生防疫事业的意义及組織	(138)
第二节	卫生防疫站	(142)
第三节	专业防治机构	(146)
第十章	工会企业医疗卫生組織	(147)
第一节	工业企业医疗卫生組織編制	(147)
第二节	工业企业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組織原則	(151)
第三节	車間医师工作的基本方法	(153)
第四节	車間保健站	(154)
第十一章	乡村医疗卫生組織	(156)
第一节	乡村保健工作的意义与任务	(156)
第二节	我国目前乡村保健組織机构及其工作方法	(157)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保健工作	(160)
第四节	苏联乡村的保健工作	(161)
第十二章	卫生宣傳教育	(164)
第一节	卫生宣傳教育的性質、目的、任务和理論基础	(164)
第二节	卫生宣傳教育的組織	(165)
第三节	卫生宣傳教育工作的原則	(166)
第四节	卫生宣傳教育的各种主要方法与形式	(168)
第十三章	医学教育及科学研究組織	(173)
第一节	医学教育的意义及方針任务	(173)
第二节	医学教育的組織机构	(174)
第三节	在职医务干部的业务教育	(175)
第四节	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意义、任务及組織	(175)
第十四章	藥政組織	(176)
第一节	藥政工作任务和組織机构	(176)
第二节	藥政管理工作	(179)
第十五章	保健計劃	(181)

保 健 組 織 学

緒 言

保健組織学是以馬列主义为指导，以近代医学科学（包括預防医学及治疗医学）为基础，来研究保健事业的原理、組織制度和工作方法的一門科学。它研究如何把医学科学的成就最大限度地同改善人民健康的实际結合起来，使人民保健事业更好地为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促进社会主义建設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

保健組織学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首先創立起来，并且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得到发展的一門新的科学。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医学院校中，这是医学生的一門必修課。为了对保健組織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苏联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并且在所有医学院中成立保健組織教学研究組。但在我国，保健組織学还是一門非常年青的科学，历史較短，专业的保健組織学科学工作者正在培养和壮大，保健組織学的科学水平和研究情况还不能满足于国家保健事业发展的要求。

作为一門独立学科的保健組織学，它研究：

1. 保健事业的基本理論：保健組織学要研究社会科学中对人类健康有密切关系的社会条件及其規律性；研究医学中对保护人类健康的自然規律；研究国家的政策与党的路綫作为保健原則方針的依据；并应用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批判资产阶級学者关于人类健康的伪善理論。

2. 保健史：保健組織学要研究保健事业的历史发展規律，繼承人类保健历史中的宝贵經驗和优秀的民族遗产，发揚历史上偉大科学家在保健事业方面的历史經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人民的保健事业的成就与組織經驗，使之結合当前党和国家的保健政策为保健事业服务。

3. 居民卫生状况：保健組織学要研究社会經濟、自然环境、劳动生活条件、文化水平、医疗預防机构的力量等因素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要用統計方法来研究居民健康状况，总结工作，评价成績，分析缺点，指出今后努力方向，为发展保健事业編制計劃、預算、拟訂人員編制提出科学依据。

4. 保健組織机构：保健組織学要研究各种医疗預防、卫生防疫及其他保健机构的种类、任务、組織与工作方法；要結合我国經濟文化等具体情况和医学科学的发展水平系统地論証全面或局部的保健措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保护人民的健康是国家的职责，国家根据勤儉办事的原則，合理、科学地組織人民保健事业，特別在我国，人口众多目前經濟水平还不高，人民的医疗卫生要求很迫切，但卫生部門的力量还不够，因此如何正确

地組織各類保健組織機構及其工作，充分發揮全體衛生人員的潛力，更有其重大意義。

保健組織學所研究的四部份內容，各自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又是密切聯繫、相互結合的。研究保健事業的基本理論時，必須根據保健事業的歷史發展規律和實際保健組織機構的工作及許多有關居民衛生狀況的統計資料。研究保健史時，必須以保健事業的基本理論為指導，應用有關居民衛生狀況的動態資料。研究居民衛生狀況時，必須以正確的保健理論為指導，才能為編制國家保健計劃、檢查保健措施的效果、制訂保健組織機構的編制標準等提供科學依據。研究實際保健組織機構的組織和工作時，必須根據歷史的經驗結合當前實際條件並且要廣泛應用統計方法及有關居民衛生狀況的資料。總之，上述四部份內容具有內在的聯繫性，保健組織學是一門有理論、有方法、有實踐、有史實可據的獨立的、完整的科學。

蘇聯、人民民主國家、中國將保健組織學作為醫學的一科，列入醫學教育的體系中，其目的是為了使社會主義制度下培養出來的醫生，不單純是治療疾病，而且要預防疾病。新型的醫生是保卫居民健康的組織者，從廣泛的意義上發揮自己的專長。離開了科學的組織和羣眾，自己應有的能力是很難發揮的。

保健組織學是醫學科學同社會科學有密切聯繫的一門科學。因此，曾經有過“社會衛生學”倡議對社會病、結核病、花柳病、砂眼以及婦幼疾病，職業病等進行宣傳教育防治工作。目前又有“社會醫學”等名稱。他們想通過研究現代生活條件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把醫學只是為提供技術和醫學是為改善人民健康這兩個看法之間的距離接近起來”，但醫學上科學成就的應用，往往被社會政治經濟因素所妨礙；只有蘇維埃保健組織奠基者——謝馬什科與索洛維也夫——所首創的保健組織學，才能真正地使醫學科學的成就同改善人民健康的實踐結合起來。它使醫務人員具有進行預防疾病的組織知識，使優越社會制度下的保健事業充分發揮其科學性，以更好的組織保護勞動人民的健康，保護社會主義建設的生產力。這就是說，保健組織學不是常識而是科學，也就是我們研究這門科學的基本目的。

●蘇聯與我國保健事業的經驗證明，在國家與黨關懷保健組織的條件下，產生了醫務工作的特殊優越性，保健機構在統一的方法基礎上，完成統一的計劃。使每個醫生都作為保健組織工作者與本身專業的醫務工作者。

很早以前，醫學活動家的實踐就證明了醫務衛生工作中正確組織的卓越意義。

如天才的外科家——彼洛果夫——於1861年在他所編寫的“野戰外科學的基础”一書中就應用自己幾十年外科活動經驗，證明醫院的行政和醫學技術有同等重要性。他寫道：“依據我個人的經驗，確信野戰醫院要獲得巨大的成就，不僅必須有科學的外科與醫療的技術，而且必須有寶貴的，好的醫院行政”。由彼洛果夫所說“行政”兩字的意義，可以想見組織工作的重要性。

同時也可以想見，正確的組織應該是在為病人利益的組織措施中，使醫務工作者的勞動發揮更大的效果。

以醫院的正確組織為例，按照衛生學和醫學的要求，應包括醫院合理建築；不同類型的醫院應有適合其任務的診斷、實驗儀器和技术性設備標準，醫院各級人員職責分工，醫院規章、制度，物質供給保證（營養、衛生技術設備、病院的衣褥及財務工作等）。

然而保健机构仅有正确組織还很不够，因为医生与保健机构的基本的工作内容与目的乃是关心居民健康，所以他們必須經常根据居民健康状况的分析来决定本身任务，改善工作方式、方法。因此，医生与組織工作者为了提高工作質量，除了正确的組織外，还必须掌握和应用卫生統計的方法研究居民健康状况（发病率、出生率、死亡率等）的变动，調查居民医药救助的需要，采用最可靠，最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来完成預防疾病，治疗疾病的任务。

第一章 保健組織的理論基础

保健事业是国家和社会旨在預防和治疗疾病，保护居民健康所采用措施的綜合；保健措施的綜合意味着为增进居民健康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保健的方针政策，卫生法令，居民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立和扩充，以及防治和消灭各种疾病等。保健事业的含意是很广泛的，它是国家和社会对人民关怀和爱护的具体表现，“保健”不仅只是少数卫生工作者的工作，而是党所领导的人民建設事业的重要活动之一。

保健事业的性质、任务、規模和組織形式，都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經濟制度；保健事业的发展是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階級的构成和科学医学水平相适应的，不同的社会里，就有着不同的保健状况。封建社会里，封建主掌握着生产资料，保健的服务对象是封建主，农民则很少或根本不可能受到国家的保护。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水平不高，即使专为统治階級服务的保健事业的发展水平亦不高，而且发展得很慢。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保健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资产階級，劳动人民则是极次要的，其内容也仅限于资产階級的階級利益的某些方面，所有的与资产階級的利益相矛盾的均得不到发展。这就表现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医疗防疫及卫生工程方面的某些技术水平较高，但由于仅为少数統治階級服务，根本不可能普遍地使用而且更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保健事业在資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有关妇幼保健、乡村保健及劳动保健等方面便相当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健则与之完全不同。所有的劳动人民都是保健的服务对象，对居民健康有关的事业都按計劃地在发展着。而且由于生产力被充分解放，医学及科学水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健的发展速度必然是远远超过資本主义国家，其发展内容是全面的，发展水平也是最高的。

社会主义保健事业是在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指导下而建立的，馬列主义认为影响居民健康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物质資料的生产方式，亦即是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合，这便向我们指出决定居民健康的因素是社会的政治經濟制度而不是其他，在这一点上资产階級学者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他們不敢同时也不能公开承認社会政治經濟制度对居民健康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科学原理，否則便动摇了資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階級的統治势力。

资产階級学者，为了把階級压迫說成是合理的現象，为了把劳动人民的飢餓、疾

病、貧困和死亡說成是“自然”的規律，他們製造出成套的反動理論，其最終目的，便是企圖證明資產階級統治是應該的，勞動人民的反抗是不必要的，社會永遠是這樣地存在着人吃人的“合理”現象。

在資產階級反動學說中表現得最積極的是馬爾薩斯關於世界人口過剩的偽科學的人口“理論”，他提出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生活資料的增长的速度，并且製造出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級数增加，而生活資料的增长按算数級数增加的关系，而最后提出世界人口已經絕對過剩，为了維持資產階級的生存必須大量消滅人口，也就是大量殺滅勞動人民的極其反動的“理論”馬爾薩斯所以要發表那套關於現有的生活資料数量与人口数量之間的不協調的現象愈來愈大的謬論，无非是為了借此做出有利于資產階級剝削者的結論：勞動羣眾的貧困和苦難，乃是“絕對人口過剩法則”起了作用的結果，他認為一個商人沒有工作已經便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了，并且宣稱“在盛大的生活的筵席上沒有他的席位大自然命令他退出人世，并且不延遲執行其判決”。

恩格斯在其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評價馬爾薩斯著作的社會傾向時寫道“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最公開的宣戰書”馬爾薩斯本人並不隱瞞其仇視人類的反動本質，他向統治階級恬不知恥地吹噓自己的著作，認為假如勞動人民能够深信他所捏造出來的“絕對人口過剩法則”，那麼這就使“下層階級顯出更大的耐心來忍受他們所處的慘痛景況，貧困將不會在他們中間引起那樣的對政府和商人的憤慨，他們將不會表現出那種經常準備反抗和叛亂的姿態，用煽動性的小冊子來鼓動他們就會比較困難，因為他們將會了解，工資和養家活口的資料的提高，不是革命所能濟事的”。

恩格斯把馬爾薩斯學說斥為卑鄙下賤的理論，對自然和人類的可憎的侮辱。

這種反動的人口論自然為資產階級所樂意接受并且大肆宣揚，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大量節育和斷種，企圖減少和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殖率。

達爾文關於物種的變異性和種間的繼承性給予生物學奠定了完全科學的基礎；正如列寧所說：“達爾文結束了那種把動植物的物種看作是毫無聯系的、偶然的、神造的與不變的觀點，并首次把生物學置于完全科學的基礎上，確定了物種的可變性及彼此之間的連續性”。可是達爾文的理論依然有他重大的缺點，特別是達爾文把關於人口過剩的馬爾薩斯學說最反動的思想錯誤地移植到了有機世界的進化論中來，資產階級“學者”在十九世紀時，就已利用達爾文所犯的馬爾薩斯主義的錯誤，開始援引自然選擇的理論來証實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弱肉強食法則的不可動搖性。而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個反動的學派；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即從生物學移植到社會中來的關於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的達爾文學說，以及魏斯曼——摩爾根和法西斯種族主義的理論交織在一起的一個反動學派。

魏斯曼——摩爾根主義者在遺傳學方面，企圖尋求遺傳性決定於所謂“遺傳質”，這種“遺傳質”和外界環境無關，他們為優生學創立了理論依據，製造出“善惡家族”的謬論，認為“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當官發財的都是統治人的，而“惡”家族都是貧窮的，有病的，都是被統治的，反動的優生學便是按照這種虛偽的學說來對待勞動人民實行斷種和節育，對資產階級便加以保存以達到“優生”的目的，現在馬爾薩斯分子主張毀滅“多余的人”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魏斯曼——摩爾根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則“科

学地論証着”这些应该首先毁灭的“多余的人”是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无耻地宣称，所有“在遺傳方面不够标准的”人都应该毁灭，而首先应该毁灭的是那些不愿意順从資本主义秩序的人，而种族主义者表现得更为瘋狂，他們牽直地要求消灭那些被他們这些法西斯敗类宣告为“劣等”的和“不够标准”的整个种族或整个民族。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作家彻底摧毁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虛伪的臆說，历史唯物主义指出，想把生物界的法則扩展到人类社会中来的一切企图，都是違反科学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服从生物学的法則，而是服从更高的社会法則，資產阶级学者力图把自然界的法則扩展到人类社会中来，把社会現象和自然界的現象混为一談，他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在說明資本主义制度的永存和不可动摇，把資本主义视为永恆的結果。

近代反动的新馬尔薩斯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特別承継着反动的衣鉢更变本加厉地販賣反动学說，如美国的反动的新馬尔薩斯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提出所謂“超人”和“劣等”人的瘋言乱語，这种“超人”和“英雄”的反动理論使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匪徒們做出駭人听闻的暴行。

关于反动的魏斯曼——摩尔根遺傳学說的謊謬早已为偉大的生物学家米丘林学說所击破，米丘林的生物学說提出生物和外界环境是在統一的整体中，米丘林反对認為外界环境在形成遺傳性状上不起作用和在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性状不能遺傳給后代的錯誤說法，米丘林用自己培育杂种植物的全部實踐駁斥了“遺傳物質”和外界环境无关的这种論点，他認為由于外界环境的影响，动植物所获得的新性状和新形态可以遺傳到后代，換句話說，米丘林遺傳学承認获得性的遺傳，这便彻头彻尾地推翻了資產阶级优生学的理論基础，指出外界环境对生物发展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米丘林遺傳学說对研究居民健康状况的規律性，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是直接告訴我們如何創造理想的外界环境条件来促进居民的健康水平。

偉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闡明人类机体和外界环境的統一和机体本身之为一个整体互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指出人体的神經系統起着調节和主导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人类机体和外界环境的关系，并且又以著名而科学的条件反射学說进一步說明了人类机体和外界环境相适应的关系，这一切均对認識居民健康的基本規律有着指导的作用，現代保健和医学的各种措施便均以米丘林生物学說特別以巴甫洛夫生理学說为依据而創立如何保护和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

其最根本的問題是改变資本主义社会制度，推翻資產阶级的反动統治建立沒有剝削和沒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才能彻底轉变那种劳动人民所处的貧困飢餓和死亡的境地，馬列主义告訴我們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滿足于居民健康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劳动人民的健康，吸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經驗逐步发展人民的保健事业。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里，在革命斗争极其緊張的时候，在物質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党对人民羣众与革命士兵的健康給予无限的关心。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以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保健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任务之一。革命的最終目的是为了保証人的智力体力的全面发展来尽量地发展生产力。中国人民在物質生活不断改善与提高的

基础上，发展了生产力，为保健事业的发展創出了更多的条件。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与文化愈发展，物质享受愈会改善，劳动人民的智力与体力越为健壮。

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我国的人民保健事业，是建立在优越的社会制度上和先进的医学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在预防与治疗疾病，保证民族繁荣，改善生活与劳动条件等方面。我们是具有极其良好的社会条件的。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揭穿资产阶级学者所臆造出来为资本主义效忠的极端反动的理论，应以人类最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彻底批判这些反动理论的社会阶级本质，以伟大的改造自然的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米丘林学说和指导医学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巴甫洛夫生理学说来驳斥这些反动理论的虚伪和捏造，并以此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保健理论，为社会主义保健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服务。

第二章 保健史及保健原则

第一节 世界保健史

医学史是研究医学活动和医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和医学的成果；而保健史则研究这些医学成果通过什么形式（组织）在实践中应用，即保健的措施。保健史是各民族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保护居民健康措施综合的发展史。

保健事业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随着不同的社会保健也在不同的向前发展。

一、奴隶社会的保健

奴隶社会是人类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一切都为着奴隶主的利益服务。

奴隶社会时期的保健特点：除进一步发展了民间医学，民间医学变为职业医学，及最早的医塾（家庭的）和医学文献的出现外，还产生了有阶级的奴隶制国家的表现之一的僧侣医学（或寺院医学）及保护奴隶主利益的卫生法规。

埃及人民在尼罗河中游和下游，巴比伦人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斯河流域，印度人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国人在黄河流域，创造了自己的事业。

古埃及的医生行医受特殊法规约束。医学技术分为种种专门科，每个医生仅专治一种病，治疗身体各部疾病皆有专家。在治疗方面遵古方，规定假使医生按照圣书条文医治，而病人死亡时，任凭如何控诉仍然无罪，反之，假使违背书中条文则可处死。

巴比伦在公元前1792—1750年间，为了保障奴隶主的利益，已在哈谟拉比法典上规定：“奴隶因医生手术而死亡或致盲目，须赔偿奴隶主全部或一半的奴隶身价，如果

盲目或死亡者为士紳則將医生两手切落作为处罰”。

在同一法典內更記有奴隶患某种病如癲癇和麻风，則他的卖身契可以失效，并将其驅逐于市外。由此，可見巴比倫人当时已知麻风有傳染性，为保护奴隶主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而采取此法防治。

据傳說在印度曾有兩種医务工作者：一种是从事刮臉、放血、拔牙等的下賤医疗者，另一种是医生。

古希腊在他們崇拜的医神埃斯叩拉西阿斯（Aesculapias）的象上，画着手扶一根蟠蛇的长杖，这蛇是象征健康、长寿和不死，許多国家的医学标幟皆出于此。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公元前 460—337 年）在他的著作中很多地方談到医生的品行和道德問題。如在著名的“医生誓言”中表明了医生与病人及病人家属之間的关系，医生和医生相互之間的关系。

希氏所指示的医生对病人的操行規則，反映出奴隶社会中（与在一般剝削制度下一样）医生地位的矛盾。他指责医生出診先要报酬并規定报酬的数目。所以这对病人是有害的，特别是在急症时，“……把病人治好后再讲报酬；比对垂危的病人先索报酬要好”。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劝告医生不要着手沉重的，难以治的病例以免引起責难，丧失名譽和职业：“医学……对于病入膏肓的人不要动手处理”。

在开业医师之外，希腊尚有为国家或团体服务的医生。有御医、軍医、海軍軍医。

統治階級为了巩固其統治势力，对貴族青年进行卫生教育及体育鍛炼，叫做“斯巴达式教育”。从历史上著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亦可表现出古希腊体育发展之状况。因为战争及运动会上竞赛时有伤害和疾病，須医生急救，所以希腊医学对于外科清洁消毒和正骨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羅馬在比較早期已实施了好多重要卫生对策。例如在“十二銅表法”（公元前 450 年）上即記載有禁止在城市內埋葬焚燒尸体；对城市的卫生監督設有專門的官吏負責。于公元前 5—6 世紀便由俘擄和奴隶建造了馬克西馬暗沟等偉大的卫生工程設施。

羅馬帝国的医生，大部分是从希腊来的移民及出身于本国的奴隶，故医生处在奴隶地位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公元一世紀凱撒专政时公布了医生可以升为公民之后，从事医生职业多起来。医生們才能組織具有法律、社会形式的医师协会。出現自由职业的医师。

二、封建社会的保健（中世紀）

中世紀保健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建立与发展了各种各样的医院。

医院起始于傳染病人的隔离室、旅行者的休养所及为老年人和殘廢者設的救济所。

十字軍东征时，麻风病广泛傳播，为了扶养麻风病患者，設立了麻风病收容所。在中世紀，傳染病之大規模流行是古代所未有的。因之出現了收容各种不同傳染病的收容所。

由于教会在許多国家拥有統治势力。为了巩固教会对人民羣众的影响，病院的管理权皆掌握在教会手中。

中世紀医院設備很差，卫生状况很坏，院內感染常有发生，造成了病人和医务人员的高度死亡，致使医院成了社会傳染源地，所以护理病人的人员，除了立誓修道者外，

很少有志愿从事护理工作的。甚至强命已判劳役的犯人从事該項工作。

中世紀大規模的瘟疫流行严重地威胁了統治者的安全与商业的利益，在十字軍东征时期統治階級为了保存其侵略势力，避免鼠疫在軍隊中蔓延，便在十字軍东去的重要交通路口上采取对人民的監視手段。在欧洲的大港埠(威尼斯、热內亚)等而建立了檢疫制度，对疫区来的船員和商旅必須强制进行四十天的隔离檢疫(Quarantine意大利文四十日)。

为了防止城市的流行病亦出現了“城市医生”和特殊的管理法規。

中世紀医学的中心是大学。11世紀到13世紀时在薩勒諾(Salerno)巴黎巴丢阿等地方兴建了大学。每所大学內学生总共不过数十人。中世紀的科学是“神学的奴仆”。大学生活制度多模仿教会生活。

大学內“經院哲学”占統治地位医学多歪曲为神学服务。

自从在教会禁止从事見血工作的外科医术以来。外科不被认为是科学而被看做是下賤的职业，外科工作落入理发业中繼續了很長的时间。一直到18世紀末外科医生的这种低賤地位始完全絕跡了。

文艺复兴后，解剖学的革新，外科的改进，生理学和組織学的萌芽，傳染病源的研究，工业卫生的注意和17世紀显微鏡的应用等，将医学在反动封建势力和神权統治下解放出来。为医学和保健組織开辟了新的領域。

三、資本主义社会的保健

在西欧由于“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封建社会瓦解，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科学文化得到了进步，医学受其影响也有很多发现和成績。随着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保健組織系統也起了变化，在該社会时期不可避免的新的使命——为資产階級生产方式服务。

在17世紀末叶，英国最先发生产业革命，到18世紀即在立法上及实际上实行了一些卫生对策，如海路的卫生保护、改善居民及城市卫生設施等等。

由于蒸气机的利用及生产工具的改良，大量使用机器生产，使城市生产迅速发展，同时造成新旧工业中心地空前未有的居民集中，由于資本家們的不关心工人的保健，招至极端的不卫生，城市的水、空气、土壤受到污染。因此，当时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等国的卫生状况开始恶化，好多流行病使城市生活癱瘓麻痺，破坏了交通的自由，阻碍了工业的发展，損害了資本家的利潤，为保护他們个人及其家族不傳染上霍乱及伤寒等流行病，才不得不对于城市及交通的初步卫生設備表示一些关心，开始創立組織、著书籍、訂计划、审議和頒布消灭一切流行病复活根源的法律。

在19世紀30年代，英国頒布了穷人的法律，基于此等法律，受到他們一点可怜的布施，然而誰如使用了这种布施，誰就被注定为正式的“貧穷者”，他的政治权力也就受到限制。

19世紀前半期資本主义国家中科学与医学技术空前的进步，工业迅速发展，对工人的剝削更加殘酷，工人階級出現在政治舞台上，資产階級与无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暴露了工人中的令人可怖的貧穷、飢餓、疾病的状况，分析了資本主义剝削的本質并指出貧穷、疾病的发生不單純是資本主义剝削的結果之一，而是資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

由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及科学技术与医学的进步，资产阶级对于舆论的压力表示让步，一方面为仍然保持个人的利益，遂在保健工作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开始设立了工厂法及工厂监督部，在工厂中开展比较广泛的卫生对策，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对女工及童工的残酷剥削上亦稍微减轻。资产阶级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完全在威廉一世的诏书中反映出来：“在跟社会民主主义斗争时，不但要用非常法律，并且必须实行一些社会政策的对策，首先是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对策”。

在卫生状况恶劣、工人外伤疾病经常发生的情况下，细菌学的成功，仍然不能解决保健问题，如结核菌被发现而结核病仍在日渐蔓延所以就刺激了“防治所”的设立。另一方面梅毒、结核对人民的威胁日益加重，出生率降低，儿童和少年身体发育水准降低，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入伍新兵体格检查不合格人数的增多，为了维持侵略势力，开始有关母亲和儿童的卫生保护政策，对学校儿童开始实行体格检查，也注意了学校卫生及儿童体育等。

因此卫生学逐渐分出了社会卫生学（社会医学），它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卫生状况的研究及社会医疗组织（医疗事业、医院、防治所、卫生组织及卫生立法）的理论。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组织，既不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而又能将资本主义剥削中所加给劳动人民的一切痛苦完全除掉。就是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也遭受到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生物学家斯宾塞（Spencer）的反对，他主张：“社会卫生对策，是帮助穷人及病人生存的办法，所以这些是违反保有人种的自然规律的”。

自19世纪末叶资本主义进入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该时期的医学和保健事业具有它的特点。

医药卫生事业成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形成了“医药联合企业”，它包括医院、医学院、护士学校等。这些机构是所谓由富裕的私人“捐助者”拿出的巨款资金创设而供给著名医学家们使用的。实际是垄断资本家在利用这数百名学者，为他们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帝国主义国家统治者企图用“科学”的结论支持他们统治世界的愿望，促使一些反动学说的出现，如遗传学、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等。

他们认为病的原因不是社会条件，而是人的生物学特性和人对疾病的倾向性，那末就没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只需要治疗疾病，必要时只消灭某一部分病人就够了。

但资本主义对新药和新诊断法的发现，和其他生产一样，都是与获得利润有关的。因此医学和其他一切科学或就一样，都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医学变成商品，只有富人才可享受。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保持健康和治疗疾病只决定于病人的物质条件，根本不决定于病人的需要。医师的劝告、手术、化验检查等——这些对病人的服务都是由维护报酬而工作的私人开业医生来进行的。如此，医生的职能成为贩卖商品并力求高价出卖的商人的职能。马克思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抹去了所有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神圣光彩，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他拿钱雇用的仆役”。马克思这些话也适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医生处境。

所以在英国、法国及其他某些国家，正是医生反对社会保险或某些免费医疗的法

律，因为这些措施“扼杀了”他們的主顧、掠夺了他們的收入。

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生分布得很不均匀，在农村地区很少，而在城市，尤其是城市的富裕区特别多，在贫困区很少。

资本主义国家在保健領域内的国家职务，主要是与流行病作斗争的卫生对策。

技术及经济方面先进的国家其卫生事业也有高度的发达，个别的国家，尤其在英国，有经过充分研究过的公共卫生、食品卫生、工业卫生等问题的卫生立法，上下水道，清扫等方面的卫生技术也发达。但其公共卫生及食品卫生发达的重要原因，是在于军事利益。

医院对于各种貧富的患者存有着等級制度，对有錢有勢的人很好，对穷人則低劣，这种现象是大家周知的事实。医学质量是随着錢的多少而不同的。穷人入医院等于入監牢獄。

可見，资本主义各国的医学和保健已走到絕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工党在1948年所实施的所謂“公医制度”实际上是些騙人的手法。他們的医院国有化的改革方案中仍著明了在国营医院服务的医师可以在自己的家庭中私自开业治疗患者，所謂国有化的医院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而沒有杜絕私人开业医师的暗中剝削。而且筹办国营医院所需要的基金，是由保險預备金中支出，此預备金是由劳动者本身繳納的。在此国有化的医院里不但孕产妇得不到免費医疗，而且沒有任何預防措施。

随着资本主义轉入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們，为了巩固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掩飾帝国主义的罪行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和民族卫生学等反动理論。

德国、日本和美国法西斯主义者手中的医学，便成了杀戮人类的工具，他們的某些医师成为野兽计划的帮凶和直接执行者，他們在活人身上作慘无人道的实验，进行所謂“科学的”研究，他們在执行罪恶的扑灭“低劣”人种的计划。

今天帝国主义国家的医学和保健已經逐步陷于瘋狂的罪恶地步。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就是人民生活 and 健康的桎梏和最大的敌人。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保健（苏联的保健）

沙皇俄国是一个地主資本家的国家，封建主和資本家毫不关心工人农民健康。

帝俄农奴制廢除后建立了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医学是比欧洲资产阶级私有医疗和慈善医疗事业较为进步的社会性医疗組織。由于一些先进的知識分子参加地方自治局工作，先进的医师們制訂了医疗服务地段制的原則；并对居民一般发病率进行了登記和研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民和工人健康和体格发育状况的卫生統計学的研究；因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羣众健康的危害。但是由于沙皇迫害以及物質条件的限制，这些稍許改善农民健康状况的嘗試取得的成績很小。

当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初期（1917—1918年）就为苏联保健事业奠定了組織基础和保健事业发展的物質基础。

1917年10月26日（即11月8日）在彼得堡工人士兵代表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员会之

下，成立了医疗卫生处，它成为組織苏联保健事业最初的核心。根据列宁倡議1918年7月召开了第一屆全俄医疗卫生处代表大会。同月又成立了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保健委員部，第一任領導人是謝馬什科，將一切医疗卫生机关均移交給它統一管理。克服了以前分散由各个部門管理的現象。

苏联政府在最初年代里已頒布了有关劳动者的劳动和健康保护的法令如：社会保險法令、母性和幼年保护法令（1917年）以及葯房和医疗物質国有化法令（1918年）等。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0年）保健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保証紅軍的医疗救助以及动员一切医疗力量 and 流行病作斗争。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医务工作者在广大工人农民的参加和支持下，胜利的完成了任务。同时在这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組織建設也有了发展。

联共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对于保健机关的整个活动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綱中写道：“首先推进以預防疾病蔓延为目的的广泛的保健和卫生工作是党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活动的基础。”明确提出了保健事业的預防方針。党綱規定保健事业最近的任务是：

（一）坚决实行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广泛的卫生措施，如：

（1）改善居民区的卫生状况（保护地面、空气和水）；

（2）根据科学的卫生原则，建立公共食堂；

（3）采取預防傳染病发展和蔓延的办法；

（4）訂立卫生法規。

（二）与社会病（肺病、花柳、酗酒病）进行斗争。

（三）保証人人都可享用免費的，熟練的医疗和葯物補助。

列宁同志在各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都特別強調了党和政府必須竭力注意与苏維埃国家社会措施密切有关的居民健康問題。由列宁簽署的有关保健事业的政府命令是保障劳动人民健康措施的理論根据。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1921—1925年）保健机构的责任是消灭战争遺留下来的不卫生状态，并有計劃进行預防措施。

第五次保健厅代表大会（1924年6月）上，索洛維也夫作了关于預防是医疗机关的任务的报告，使預防与治疗工作結合起来。这次会还决定积极对社会病开展防治工作。因此要求大大扩大防治所。

其次，保健工作者在这些年內对流行病进行了頑强持久的斗争。到1923年主要傳染病患率比过去几年大为降低，基本上取得預防霍乱的胜利，斑疹伤寒患病率也繼續下降。

1925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屆全苏地段医师代表大会，对乡村苏維埃八年来的保健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拟訂了乡村保健工作在苏維埃制度下的任务。

1924年6月全俄医学教育改革會議，討論了苏維埃需要什么样的医师問題。苏維埃医师对疾病必須有正确观念，疾病既是生物現象又是社会現象，学生必須掌握疾病与生活，劳动条件之間的关系。

1922年莫斯科医学院社会卫生教研室（即現在的保健組織教研室）的建立，对学生

正确理解苏维埃保健原则，反对资产阶级反动的保健理论方面起了很大影响。

第12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25年5月）讨论了人民保健委员谢马什科的报告，并在决议中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保健委员会完全正确的拟定了保障人民健康的纲领，它包括：

（一）组织医疗卫生网，以保证劳动人民得到免费的、技术精湛的和大家都能享受的医疗。

（二）在保持健康的基础上，对工人农民的劳动与生活采取预防措施。

（三）广泛地引导劳动人民自己参加到保护他们健康的工作中去，并广泛地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卫生宣传工作。”代表大会还认为医学统一的原则是正确的，即将保健事业的一切部门的管理完全集中在一个机关：人民保健委员会。

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时期（1926——1934年）保健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

1929年12月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工人与农民的医疗服务”的决议是苏联保健事业发展中重要的历史标志。决议在确认苏联医学的成就后，指出保健事业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工农的需要。保健机关按照党的指示应该越来越多地考虑大工业、新建设、乡村国营农场及集体农庄的需要。

对工人进行优先的医疗服务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生产方面执行着最重要的任务。为了提高产业工人医疗服务的工作质量就要求治疗机关靠近企业。因此在新建的工厂内建立了医院与门诊部。企业保健站也得到了发展。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规模，巨大工业和新城市的不断出现，政府于1933年通过了关于组织全苏卫生监督的决定。这个决定曾显著的提高了卫生组织的权力，使国家卫生监督机关能够更好的执行对工业、市政建设、食品工业、学校及儿童机构的卫生监察任务。

在此期间对劳动农民的医疗服务也得到相应的发展，降低了乡村居民的传染患病率；提高了乡村的卫生情况；在乡村中出现了医疗工作新形式——医疗队，在农忙时派往乡间进行医疗预防工作。同时少数民族共和国保健也得到高度发展；在这些共和国内对梅毒、结核、沙眼等社会病所进行的斗争，把少数民族从濒于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

此时医学科学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于1932年成立了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

1936年12月苏联新宪法的通过是苏联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即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而斗争的时期。在这个宪法中有许多条款专门阐明保护劳动者健康问题。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美、英、法）宪法上都没有记载保护自己公民健康的国家义务。

1936年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人民保健委员会（后改为保健部）领导全苏保健事业。

1938年4月政府关于巩固乡村医务段的决议在改善集体农庄农民医疗服务工作中具有巨大意义。乡村医务段、医士助产士站，是乡村医疗服务接近集体农庄农民的重要环节。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突然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保健工作新的任务就是保证前线的医疗救护，防止流行病蔓延以及后方

城市和乡村居民的医疗卫生工作。在全体医务人员努力下保证了73%伤病员迅速归队；世界上所有的战争中，任何军队也没有象苏联军队这样高的归队率。其原因在于充分运用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军事医学的经验；充分发挥苏联保健已有的成就；并制订了新的伤员治疗后运的组织原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6年3月苏联政府“关于科学分析和总结1941——1949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医学经验”的决议，直接推动了对苏联保健事业经验，特别是卫国战争中军事医学经验的科学总结工作。

战争中的防疫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全国各级政府均成立了非常防疫委员会，整个苏联保健系统和社会团体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保证了战时在前方和后方没有流行病的蔓延。

战时对于保护儿童和母亲的生活与健康也给予特别的关心。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党和政府对医学科学研究仍给予极大关怀。1944年将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改建成苏联医学科学院。

在战后时期（1946——1956年）的保健：1945年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在保健工作的前面摆着消灭战争所带来的卫生方面严重后果的任务。由于党和政府对保健事业的关怀，到1950年底城市病床数已超过战前水平（1940年）27.5%；乡村地区病床数超过31.5%；在工业企业内大大发展了医疗卫生网；在所有乡村地区均设立了卫生防疫站。战后还大大发展了疗养事业，到1951年苏联已经有350处疗养地和2,000所疗养院。

1947年9月17日苏联保健部决议，将门诊部与门诊所和医院进行合并。合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医院与门诊部治疗的脱节现象，以提高对居民的医疗服务质量；同时还必须保证提高医师的技术水平。在城市医院和乡村地区地段医院内的医疗工作中，防治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948年由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所召开的关于根据米邱林学说的观点讨论生物科学现状的会议以及1950年苏联科学院与医学科学院讨论巴甫洛夫生理学说的联席会议对于医学和居民保健问题起了很大的影响。

40年来苏联保健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立了强大的医疗预防机构网到1957年初苏联有1,360,000张病床（1913年只有142,000张）疗养院及日间休养所有448,000张床位。卫生防疫组织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现在每一个区内均设有区卫生防疫站。到1957年初拥有医师354,000（包括牙医师，不包括军医），医师数与居民人口的比例按每1,000居民计算已经占到世界先进行列（约每千人口1.7医师）个别共和国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及格鲁吉亚共和国在373—490人中即有一名医师（美国723人中才有一名医师，法国及英国每1,000人口一名医师）。居民死亡率迅速降低；1913年每千人口死亡30.2人；1956年为每千人死亡7.7人；平均寿命比革命前增加1倍；1955—1956年平均寿命67岁。现在苏联已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回归热；疟疾也基本上消灭了，在最近几年内可以消灭白蛉热、钩虫病、砂眼及性病等。

目前苏联正为胜利执行第20次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巨大任务而努力。按照新的五年计划：到1960年医院病床数将比1955年增加28%左右，托儿所床位增加44%，幼儿园床

位增加45%疗养院床位增加10%，休养所床位增加13%。

根据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苏联医学正为实现下述一些目标而奋斗。例如在预防与治疗心脏血管疾患、风湿性疾患、恶性肿瘤方面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以便给保健事业实际工作提供有效的斗争组织形式和方法。要求更有效的研究一些广泛存在的疾病如流感、咽炎、小儿传染病及肠道传染病等，以寻求其防治方法，要求在最近几年内迅速降低结核病发病率从而准备消灭这种病的条件。在医学科学思想上把巴甫洛夫生理学说更有效地贯彻到医疗预防机构的实践中去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为保护劳动人民健康创造了前提条件。苏联共产党在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不断地强调保护广大劳动人民健康的重要意义（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少的机能）。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著作以及共产党有关保健事业问题的决议，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社会主义保健的理论基础。

预防思想是苏联医学的指导原则。在苏联地段医疗和防治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种形式是苏联保健工作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在苏联卫生防疫组织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此外在保护与增强人民健康的工作中，广泛地开展了卫生宣传以及劳动人民主动自觉参加的形式，也是苏联保健的特点。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节 中国保健史

一、古代的保健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黄河流域是世界最古的文化中心之一。我们的祖先在长期创造性的劳动实践中积累了生产斗争知识，同时也积累了与疾病斗争的经验。

相传在远古时代有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反映了人类医药活动的萌芽是与采集植物种植植物的劳动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

到了商代，根据甲骨文中记载的宫室器用中有很多食器的名称以及近年发掘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可以说明当时的卫生文化情况。

到了奴隶社会时期，社会上分离出“巫”这种人专管占卜祭祀等，他们除了占卜祭祀以外也应用一些人类长期劳动积累下的有效疗法。这就是所谓医巫不分时期。资产阶级学者故意歪曲这一事实，否认人类早期医学保健的萌芽是人类祖先劳动实践的结果，所谓医学起源于魔术，或者起源于巫的说法最终坠入为宗教辩护的唯心主义泥坑。

二、封建社会时期的保健

从周代直到清代（1840年鸦片战争时）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保健组织活动实质上只是为皇室宫廷及封建主服务，封建主只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化，为了缓和农民反抗时才施行一些救济性社会卫生设施。

春秋战国时期鬼神致病观念开始动摇；巫和医逐渐分离。例如公元前578年晋景公病，先召桑田巫，后又请医缓（传说是周代的名医）。战国时名医扁鹊，据史记扁鹊仓